

在蘇州府城西  
九里奇司使王均  
計登後松為寺兩  
崖峰分則池在而  
石泉清於下可測  
相傳為閩閩公節  
處前為千人石香

杨念群 著

# 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  
与士林精神世界  
的变异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 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  
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此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清代政治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770105）的资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  
的变异/杨念群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10.7

ISBN 978-7-108-03471-7

I. ①何… II. ①杨…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  
国—清前期 IV. ①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242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扉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7

字 数 347 千字 图版 9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 目 录

导论 “汉化模式”得失谈与“江南”的复杂涵义 \_\_\_\_\_ 1

是“汉化”还是“华化”？ \_\_\_\_\_ 3

“江南”想象：地理的、文化的还是记忆的？ \_\_\_\_\_ 11

本书各章主旨 \_\_\_\_\_ 15

## 第一章 “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

“残山剩水”之喻：“南宋—晚明” \_\_\_\_\_ 20

一张旧图诱发遗民隐痛 \_\_\_\_\_ 20

“残山剩水”中的遗民记忆 \_\_\_\_\_ 25

“残山”与“剩水”之间：“出”与“处”的两难 \_\_\_\_\_ 32

“山水”易色与风俗之变 \_\_\_\_\_ 32

“外压”与“内讧”：暴力的传染史 \_\_\_\_\_ 35

遗民何以会“死易生难”？ \_\_\_\_\_ 45

“出处”涵义新解与士人群体分化 \_\_\_\_\_ 49

## 第二章 礼制秩序的重建与“士”“君”关系的重整

小引：江南“山水”异色之后…… \_\_\_\_\_ 59

“收拾残山与剩水”：移风易俗的意义	62
“城市”—“乡村”的对峙意象	62
“夷狄之变”与世家、古礼之兴废	71
“士”“君”教化角色的转变	80
对“明末士风”批判的双重意义	80
帝王也谈“三代”	86
从“经筵会讲”看“士”“君”教化角色之逆转	91

### 第三章 “涉世利生”之下的士风转型

小引：乾隆与遗民的同一困惑	103
复社“余孽”吕留良	105
党人碑里姓名非	105
搏斗于“失节”梦魇之中	111
遗民的交友之道与生计选择	116
感悟另一种“出处”之境	116
八股选家与“道义”担当	126
不一样的朱子“卫道士”	132
此“崇朱”非彼“崇朱”	132
谈宋成癖与持守“家法”	135
“选学妖孽”的多重身份	141
“天盖楼”商业运营网络	141
盖棺尚未论定	145

### 第四章 “文质之辨”：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上）

小引：雍正如何感知“江南”的文化威胁？	149
鼎革期士人的生活样态与“文质之辨”的再兴	153
守“文”还是趋“质”？清初士论的两种选择！	153

#### 2 何处是“江南”？

经典“文质论”与清初士论的呼应关系	156
“南宋—晚明”历史反思框架下的新“文质论”	159
“新文质论”与士人行为的自我规训	164
<b>“文质论”的重构与“夷夏之辨”历史记忆的纠葛</b>	<b>172</b>
“文—质”，“南—北”	172
“文—质”之辨与经典重述	181
“文—质”关系与先秦历史观的改写	183

## 第五章 “文质之辨”：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下）

小引：“文质”与“教化”	186
清帝对“文质论”的回应及其与士林舆论的合流	188
汉满族群对“文”之涵义理解的趋同	188
“质胜于文”：一种新解读	192
清帝如何应对江南风俗之变？	196
对“质”的正面肯定：一种统治术	196
“同中有异”：汤斌与康熙帝眼中的江南风俗及其治理	201
“质表文里”：帝王生活心态的深层纹理	209
南巡盛典与乾隆的“奢俭观”	215
一点余论	226

## 第六章 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

小引：从两封交战文书说起	230
“正统论”谱系简释	234
空间、时间和种族	234
朝代更替间到底要比赛什么？	237
各取所需的选择：从“北宋”到“南宋”	241
宋遗民的看法：种族问题何以凸现？	246

“道统”与夷夏大防的纠葛	253
对“道统”意义的甄别、更改和攫取	261
以“一统”扩张消解“种族”之别	261
破解朱子魔咒	264
历史编纂体系中的君王与士人	269
《通鉴纲目》如何进入皇家视野	269
书写规则的制定与乾隆的“节义观”	271
“君师”与“道治”角色的合一	278
士人的反应:以袁枚为例	284
遗民史学内在精神的集体坍塌	287
私人撰史与故国之思	287
帝王对“私史”与“官史”之关系的认知变化	294
士人对历史褒贬权力的自觉舍弃	300

## 第七章 “经世”观念的变异与清朝“大一统”历史观的构造

小引:“经世”新解	304
“私言”如何转化成了皇家“公言”?	308
儒藏说:公私之辨	309
私门失守:流通的有序化	313
“官师合一”的复古真相	318
士林气质与征集遗书行动的“官守”品格	319
区分“记注”与“撰述”:以复古为旗帜	322
革除“私意”:“遗民观”与历史书写	325
为何崇“周公”而抑“孔子”?	331
孔子出现的意义	332
重释“道”与“器”的关系	334
“道”在历史中的消解和重建“道”之秩序的条件	337

以“吏”为师:方志修纂与“大一统”的文化布局	342
“治史”与“治国”	343
修志与辅佐政教之关系	345

## 第八章 文字何以成狱?

小引: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	349
“托隐逃禅”未必能“咸登彼岸”	352
“观风”内蕴的转变	352
金陵“衣冠冢案”引出的话题	358
逃隐风格与度牒制度	362
查禁逆书与“驭人之术”	368
欲擒故纵	368
监控嗅觉的培养	372
《字贯》案牵带出时文追缴潮	380
文网重压下的士风重组	385

## 结论 一个场景和四个问题

一 从“明”到“清”:“连续”还是“断裂”?	390
二 对朱子的崇抑:维系“道统”? 改纂“道统”?	392
三 “经世观”的“常态”与“变态”	397
四 清朝的“大一统”布局与“江南”的特殊地位	402

后记 407

参考书目 411



## 导论 “汉化模式”得失谈与“江南” 的复杂涵义

本书的目的是探究清朝早期“满人”和“汉人”之间如何在一种广义上的“地人关系”基础上建立起历史意识的联系。“地”是指“江南”地区，“人”当然有所特指，是指清代早中期生活在北方京城的帝王和生活在“江南”的士绅阶层。清朝君主人关后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其一是疆域边界的拓展和底定问题，以使得自己在空间意义上居于合法的地位；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其统治的出发点在于如何建立起一个包容性更强，能够容纳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政治体制，这种包容性是对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加以利用和容忍的结果，因没有固定的前朝经验可循，故多少具有“断裂性”的特点，处理的是一种“多”的关系；其二就是面对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汉族文明”的挑战，因汉族文明历史传承悠久，只有消化和模仿汉人文化，才能有效地治理汉族地区，也才能使得制度安排有效地延续以往王朝的统治机制和风格，减少过渡期遭遇的诸种难题。处理的是一种多少带有“连续性”的“一”的关系。

无论是“多”还是“一”，都是“人地关系”在“文化”选择方面的表现方式，其中的内涵远为复杂，并非呈现出的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人地关系”。从明清易代的历史观察，文化意义上的“地”使得此地之

“人”始终秉承着浓厚的优越感和历史记忆,当遭际外来民族的入侵时,这种优越感和历史记忆如何加以维系,而外来民族到底是采取放任其延续优越感和历史记忆的策略,还是刻意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特质,借助各种手段修正被征服之民族的历史记忆,以消弭其对异族的抗拒姿态,均成为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关节问题。

从各族平等的抽象意义上说,每个民族都从自己的位置出发认定其文化具有核心的价值和意义,但就区域之间的比较而言,谁能把自己的文化核心价值渗透扩展到其他民族,却并非一种简单的认同程式所能完成,其中必然伴随着复杂的权力运作过程。故我们谈论民族的认同问题,也必须把它放在一种现实和历史的权力关系的博弈中加以观察,而不可戴着一副捍卫“民族自觉”的抽象有色眼镜对之加以貌似“正义”的品评和裁量。

如此看来,清朝甫一建立,统治者就面临如何处理“多”与“一”的关系问题,但这两个关系到底孰轻孰重,却在当代史学界遭遇到了空前激烈的争论。传统的历史解释坚持的是所谓“汉化模式”,即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以中原和江南为核心的汉族文化的影响,历史发展过程中虽不时有异族统治的王朝出现,但其本质上都是完全接受汉族文明涵化的过程才得以确立其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图景。最近渐趋兴盛的“新清史”解释则极力反驳清朝渐趋汉化的历史观,指出清朝君主熟练地运用“满族文化特性”恰恰是其统治成功的关键,“满族性”包括“八旗制度”等等特殊治理策略的发挥,加以清初统治者对其他民族文化特性的包容和尊重才成就了清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种以“多”拒“一”的历史解释目前相当流行。

本书不拟介入“多”与“一”孰轻孰重的无谓争论,也拟避开清朝到底是“汉化”还是“满族化”的选择困局,而是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江南”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统治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有些

并非是在直接接触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但却通过“权力博弈”和“精神史”的脉络相互发生着复杂的纠葛关系。同时这种关系成为清朝建立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想说明的是,广义上的“汉族”无疑相对比其他民族更有把自身文化扩展到其他地区的影响力,这并非如“新清史”所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产物,而是大量细致研究证明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同化力”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就能证明“汉化模式”的成立,因为清统治者和其他民族也并非是无创造力地被动接受汉族的同化,而是主动去利用其核心价值以为己用。本书证明,清统治者发挥其高超的统治技巧,成功地收编了“江南”士大夫的历史与价值观,使之成为“大一统”统治模式的合法性资源,其复杂的治理技术的运用显然与前代迥然有别。

## 是“汉化”还是“华化”？

在当今史学方法论的变革潮流日新月异,话题转换速率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谈论清代前期的历史仍关注所谓“江南”问题似乎给人感觉有些“过时”,原因在于最近十年“新清史”的崛起所构成的挑战,使得“江南”问题被逐渐边缘化了。在传统清史的研究脉络里,每当说到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时,似乎总是在强调其作为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一个样本而加以分析。也就是说,清朝的建立不过是既存的以汉族文化为中心之政治社会体制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套叙事逻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受到严厉批评。何炳棣和罗友枝在《亚洲研究杂志》上爆发的争论把清朝统治是“汉化”还是“非汉化”的争论推向了高峰。何炳棣依然强调“汉族”作为一种可以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力量,包括儒家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具有无与伦比地吞噬改造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强调“文化”的融摄能力决定种族优越的程度。

因此,何氏坚持清朝建国是“满人”被“汉人”同化的后果。“优势

文化”的确立是消弭种族差异的最核心要素。罗友枝反驳这种“汉化模式”，批评以汉人文化为中心的观念无法解释清朝君主对广大非汉族地区的成功统治。然而奇怪的是，罗友枝的批评仍纠缠于哪个“族类”更加优越的历史比较观，反过来强调“满族特性”在清朝统治中的支配作用，结果还是缠绕在“何氏话题”之中。故“新清史”的后续著作仿佛就是为了专门矫正“汉化论”的偏颇，而刻意论证所谓“满族性”的存在以及它所具有的强大认同力量。这种“满汉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成为“新清史”反驳“汉化论”的学术起点。于是，“种族差异”前提下的“文化优越性”就被断言为清朝统治特性的核心论题。换句话说，“谁同化谁？”的争执仍是分歧的焦点。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同化”何止是一个所谓单向“文化渗透”的问题，清朝统治的特性并非简单是种族区分意义上的“谁涵化谁”，也并非“文化自守”的历史逻辑所能概括，更非“汉化”还是“满族性”谁更具文化磁场的吸摄能量所能说明。恰恰相反，仅仅从“同化程度”的角度或从争夺“同化霸权”的意义上诠释清朝历史的模式都是有缺陷的。

“新清史”批评“汉化模式”完全是近代民族主义激进思想衍生的产物。是梁启超、章太炎等以反满言论催生新崛起的“中华民国”的话语后果。特别是梁启超引进达尔文进化理论后，“汉族”被界定为一个界限明晰的民族，从而建构起了一系“中国”乃是“汉族世系”的民族主义想象和中国认同意识。<sup>〔1〕</sup>从表面上看，近现代的许多历史研究者在评价清朝历史时确实是有感于当时中国四面受敌的糟糕境遇。如陈垣撰《元西域人华化考》就毫不掩饰地自述其动机云：“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sup>〔2〕</sup>钱穆撰《国史大纲》也在首页公布读者阅读此书时应具之信念，其中就说到要对本

---

〔1〕 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

〔2〕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818。

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以防堕入“虚无主义”和文化自谴。

钱穆以下这段话特别能表现他撰写《国史大纲》的意图,他说:读史与国家向前发展的希望在国民对国史的了解:“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1〕其中多次提到“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核心意义。如他还有以下之言论,说:“民族之转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某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转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之息绝为可悲。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2〕

犹可注意者,钱穆强调的仍是在外部非汉族势力包围下保存“文化”的意义,如他具体谈到中国历史中清朝统治的阶段时,就认为清朝建立的是“部族政权”,与汉人建立的“士人政权”相对立,也可以说是士人政治传统的变态。“部族政权”即是“异族政权”,由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就不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这与“士人政权”有天壤之别。〔3〕“士人政权”之所以能称之为“政治制度”而区别于“部族政权”,即在于其后有“文化”在起作用,钱穆这里所说的“文化”

〔1〕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页1。

〔2〕 同上书,页32。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43。

毋庸置疑是从“汉族文明”出发而加以界定的。但必须指出的是,钱穆对清朝历史的解读并非是近代以来由西方输入的民族主义种族论所建构起来的,而是受到了中国历史上由“种族”辨别“文化”的历史观的深刻影响。

从表面上看,钱穆的这段表述受到西方进化史观的启迪,强调的是“文化”会随历史的演变而发生作用。其实,钱穆等人使用的叙述框架仍是来源于宋代以来经理学家所改造过的《春秋》“夷夏观”。突出的例子是当谈到明朝崛起时,钱穆仍会说:“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sup>[1]</sup>我们注意到,在这段表述中他仍使用“胡”作为描述蒙古人的字眼。还有一个例子可以间接地证明钱穆“文化决定论”的来源,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钱穆批评那些激进分子对文化保守人士的攻击,说对待那些“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sup>[2]</sup>这句评论恰也从侧面揭示出钱穆的思想非源自近代,而实可溯至宋朝。陈垣曾批评元朝刘因阻止西域女真人古里氏改汉姓。他的理由是“种族狭隘之见,不应出于大一统之时”,<sup>[3]</sup>陈垣所理解的“大一统”仍是以汉族为中心吸收周边民族之文化的“汉化”历史观。显然他们两位的“汉化观”均非是近代民族主义影响之下的选择。何炳棣在反驳罗友枝时,其“捍卫汉化”的主要理由就是清朝贯彻程朱新理学,并把它作为汉化政策的核心内容加以辨析。<sup>[4]</sup>尽管清朝早期的各个君王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不尽相同,如康熙帝大力崇朱而乾隆却有贬抑朱子的倾向,但何炳棣仍坚持清人从宋代接续“道统”的一贯说法。可见其“汉化说”的源流并非来自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言说,而是承继了士大夫的叙述传统。

---

[1] 钱穆:《国史大纲》,页12。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

[3]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页96。

[4] 何炳棣:《捍卫汉化(上)》,《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何炳棣的“汉化说”在延续传统历史叙说的层面上无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就融汇了古典“华夷之辨”的成分。古典“华夷论”往往会出现在鼎革世变的时期,比如宋末、明末清初或者是清末,一部分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鉴于王朝塌毁的现实,而归咎于民族差异的积怨,认为是劣等民族以蛮力取得天下,须效法汉族文化方才有资格取得统治合法性。而在历史上大部分的安定时期,士人实际上均无严格意义上的以“种族”区分“文化”的传统。陈寅恪即已指出,至少在唐代士人中还盛行以“文化”而非“种族”区分人群的看法,“汉化”与“胡化”交织进行,并无以“种族”差异区分“文化”优劣的固定模式。<sup>[1]</sup>以后的北宋和明代初期士大夫言论似乎均沿此义而行。宋代士人虽均尊《春秋》大义,但解释却有不同,对《春秋》主旨“尊王攘夷”的理解在南北宋就有差异,北宋仍以“尊王”为主旨,南宋则以“攘夷”为旗帜。<sup>[2]</sup>故所谓“汉化史观”也只能在“攘夷”的历史解释框架内得以存有一席之地。

宋代儒者发明出了一个儒家“道统”的传承脉络,这个“道统”的建立背后有一个“攘夷”的论断作支撑,故朱熹才撰《资治通鉴纲目》以张其说。但南宋士人强调以种族差异为“文化之别”的基础却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即希图以文化优势消弭地域控制的狭小所带来的心理焦虑。其背后的理念是,“蛮夷”虽占据广阔疆域,却因其种族之劣而缺乏文化上的优势,当然不具备统治合法性。既然无法得“地势之正”,则须突出“文化”的涵化统摄作用,这是南宋以来才形成的理念。这套论说在清初即已被“大一统”的统治言说所化解,清初统治者清除的就是士人刻意构设出的“夷夏之别”的界限,以“礼仪”别内外,而非以“种族”别内外应是清朝君王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突破南宋士人叙述框架的最大收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16、页27—28。

[2] 饶宗颐:《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页75。

获。<sup>[1]</sup>但这并非意味着清朝君主已经逾越了儒家正统观的限制,倒毋宁说是克服了宋代的狭窄“人地关系”的文化解释,而回归不以“种族”划分“文化”的汉唐模式。

因此,清朝建立自身正统的过程当然不是简单的“汉化”与否的问题所能概括,比如帝王对江南士人诗文唱酬的因袭模仿还只是一种表面的“汉化”行为,而清朝帝王对宫廷礼仪与地方宗族重建的重视,对以“家”为单位的“孝”文化的倡导则是全盘从“中华礼仪”的建构方面考虑问题了。故以“汉化论”还是“满族性”的模式估量其特征之所在均会不得要领而失之偏颇。当代学人更不应再以“种族论”作为判别异族统治时期文化优劣的前提。陈垣当年即已朦胧注意到使用“汉化”一词的危险性,故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的书名上特意使用“华化”而非“汉化”来概括全书主旨,尽管其内容仍沿袭的是“汉化”的解释传统。

南宋以“文化优势”抵消“空间逼窄”之痛的言说模式在建国以后的史学叙事中会不时以政治表述的方式再现出来。比如顾诚在《南明史》一书中就以为满洲贵族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汉人一方虽被征服却拥有“较为先进的汉文化”,<sup>[2]</sup>表面上完全用的是一套现代政治经济学用语,背后仍潜藏着南宋夷夏论的暗影。

有鉴于“汉化模式”过度注重以“文化吸摄”的“文明观”替代“边疆治理”制度分析的倾向,“新清史”特别关注清朝在疆域拓展和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发现清朝的鼎盛时期似乎并非视中原和江南地区为核心,其关注视野放在远为辽阔的亚洲腹地:蒙古、西藏和东北、新疆;中原和江南只是其全盘“大一统”规划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朝同等对待亚洲腹地和中原江南地区。“新清史”的每一项研究都以不同的方

---

[1] 关于清朝君主以“礼仪”消弭内外之别的统治策略,可以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579—590。

[2]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页3。



式印证了清创造性地将亚洲腹地和中原传统相结合。换言之,他们在定居的中原农业世界和其外的草原游牧世界间,设法创造出一个连续体,两者间在过去曾有过严格界限。〔1〕

罗友枝也认为,清朝成功的原因不是“汉化”,而恰恰相反,至少从帝国缔造来说,在于其具有利用与内陆亚洲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并使对非汉地区的管辖区别于对前明所属省份的管辖能力。〔2〕以上观点极力打破原有以中原、江南汉族文明聚居区为基点,涵摄边疆民族的“核心—边缘”分析框架,强调“满族性”在整个帝国建构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满语、“八旗制度”等特殊因素的重要性。罗友枝主张在中国史编纂中采取“去汉化”的书写策略,认为“汉化”是二十世纪汉族民族主义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是近代以来建构起来的议题。这种置“边缘”议题于观察“中心”的书写策略成为“新清史”研究出现繁盛局面的最重要动因。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如张勉治虽然力图纠正仅仅从疆域构造的角度重读清史的偏颇,似乎仍然重视“江南”问题的地位,却把“江南”看作是清整体性的“战争武力”规划的一个部分,“南巡”被描述为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战争路线行进的行动,意在提醒南方人注意清的强势武力。从他给自己的著作起名为《马背上的朝廷》即可看出其中的用意。〔3〕

“新清史”颠倒“中心—边缘”历史叙事框架的努力虽颇具新意,但显然是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史的脉络里来观察清史的演变历程。比如过度强调“满族性”与“汉化”的对立,就是想以纯粹的“族姓”界定出特殊的人群,以此证明其统治合法性有别于以往的汉人王朝,这是与以现代民族国家理论预设“一族—国家”的预期相吻合的。他们没有意识

〔1〕 参见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 张勉治:《再观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介绍一篇西方研究清史问题的论文》,《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 - 1785*.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